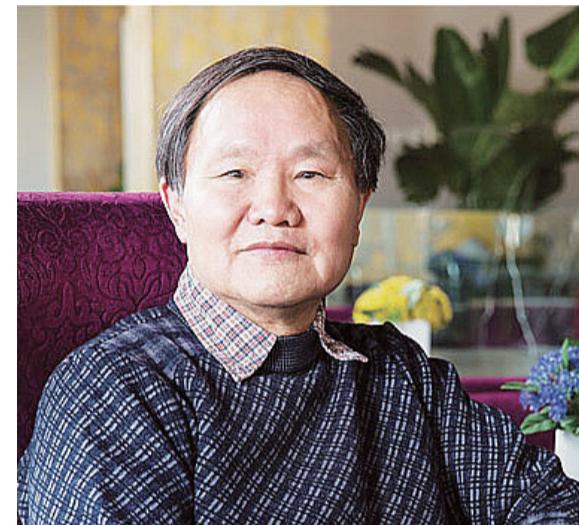


作家要不断向生活学习

——访作家刘庆邦

□本报记者 王 兮



活。这些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流淌，只要拿起笔来，我脑子里活跃的就是乡村父老和矿工兄弟的形象。

我比较关注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也写过一些农民在城里的遭遇，比如长篇小说《红煤》、中篇小说《到城里去》等。我还关注农民变成矿工的问题，它集中体现了农民进城打工和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现实。我之所以强调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深刻的现实，是不想被行业所限，只是把煤矿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和舞台，以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我还愿意把我所写的一系列煤矿题材小说看成是“在深处的小说”，不只是在地层深处，更是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文学毕竟是从内心世界开始，向外部世界辐射，从认识个人开始，认识整个世界。个人的命运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体现在个人身上。如果要给自己的写作找一个目标的话，那就是怀抱人文主义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诚的态度写人，写人的丰富情感，直抵复杂的人性深处，建设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

记 者：您曾有过多年的矿区生活经历，每天都要深入矿井，之后又从事过煤炭地质系统的宣传报道等工作。这些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庆邦：在矿区生活时，我最向往的职业是能当一名记者。调到煤炭部当上记者之后，我热情很高，一有时间就积极到全国各地的煤矿采访。如果说我的矿区生活是一个点，当上记者之后，生活的面积大幅度扩大，由点变成了面。全国各地的煤矿，除了西藏的煤矿，大部分煤矿我都去过。当了20多年记者，对文学创作很有好处。一是打开了眼界，拓宽了胸怀。人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多大。眼界到哪里，境界才能扩展到哪里。二是立足点发生了变化。当记者使我站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立足点上，不知不觉就要面对全国的读者，和全国的读者对话，甚至和世界的读者对话。三是在采访中得到了不少小说写作的素材。一篇新闻稿子写完了，觉得自己想表达的感情没有很好表达，想写的细节不能充分展开，有一些想法也不便在新闻里说，于是便写成了小说。

当记者期间，我曾多次参与报道矿难，情感和心灵受到了强烈冲击。1996年5月21日平顶山煤业十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84名矿工在事故中丧生。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赶到平顶山采访。说是采访，其实我主要是看、是听，是用我的心去体会。那些工亡矿工家属都处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我不忍心向他们提问什么。那几天，我天天跟那些家属在一起，我的心始终处在震荡之中。我咬着牙，一再对自己说不要哭，可眼泪还是一次又一次涌流出来。我无力为他们做什么，只能用纪实文学的形式，较为具体、详尽地把事故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记下来。我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一个矿工的死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广泛的，而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而不是短暂的。这篇作品在全国煤矿系统引起持续性的反响，至今不少煤矿还把它作为对矿工进行安全教育的教材。

记 者：有人认为，“作家不用深入生活也能写出好作品”，“作家平日就一直处于生活之中，无需再刻意深入”。您对此怎么看？

刘庆邦：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要取暖，就得挖煤；要酿酒，就得种粮食；要持续写作，就必须不断向生活学习。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就好比梦是对生命的虚构，没有生命就没有梦；树影是对树的虚构，没有树，虚构就无从谈起。人的想象不可能凭空，都离不开生活这个根本的基础。的确，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创作素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经历有限，你写少量的东西还可以，短时间写作还可以，要做到持续写作，不断拿出新作品，仅靠自己的生活，写作资源就会枯竭，甚至会出现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的情况。还有一个审美对象的问题。作家可以自怜、自恋，可以把自己和自己周边的人作为审美对象，但久而久之，那样的东西是不是有些单调呢？胸襟是不是有些狭窄呢？作品的格局会不会有些小呢？分量会不会有些轻呢？文学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关注和表现民众的疾苦。如果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不关注、不了解普通民众的疾苦，谈何表现呢？

深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件自然的事，也是一种纪律。不是别人要我深入生活，而是我自己要深入生活，到农村去，到煤矿去。农村的点比较固定，那就是我的老家。我到煤矿深入生活的点则多一些。这些深入生活的实践都给了我丰厚的回报。

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题材，一半是乡土题材。比如他今年推出的长篇小说《黄泥地》，有评论家称其“是用光秃秃的笔在黄泥地上辛勤雕刻”。虽然时代不断改变，可他对现实主义创作的那份执著却从未更改。

记 者：您多年来坚持现实主义写作。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认为自己的作品中有哪些变与不变的东西？

刘庆邦：可能因为我生性比较固执，做事“一根筋”，不够灵活。我认为人只有一生，我这一生在创作上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我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解比较宽阔。只要不是写人的前世，也不是写人的来世，只要写了人的今生今世，就是现实主义。前世和来世，都是源于一种想象。不管往前想象，还是往后想象，想象的基础还是今生。我的想象离不开脚下的土地，离不开我的经历。加上我的小说本来就是写实的、及物的，是严格按照日常生活逻辑推动的，怎么能脱离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呢！

风在变，云在变，社会千变万化，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是人类永恒的审美对象，比如太阳和月亮。阳光给人光明，给人能量。月光给人慰藉，让人遐想。世界就是这样，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文学创作主要是表达情感的，情感之美是核心之美。写作手法可以变，表现形式可以变，载体可以变，但情感作为文学作品的根本支撑，这一点不会改变。衡量一篇作品优劣的标准，还是要看作品里所包含的情感是否真诚、饱满，让人感动。

创新当然好，创新的呼声也很高，几乎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标准。然而情感不分新旧，好作品里动人的情感力量会让我们常读常新。文学从来不是集体的事业，是心灵化的个体劳动。文学不是时代的闪光，是个体心灵的闪光。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却不是时尚的产物。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记 者：煤矿和乡土几乎构成了您写作的全部内容。您曾说：“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对此应如何理解？

刘庆邦：我写农村生活和矿区生活的小说比较多，原因很简单，我熟悉农民生活和矿工生活，或者说我曾经是一个农民，也曾经是一个矿工。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就回村当农民去了。我不想当农民，也不是一个好农民，但那几年，命运的泥巴吸住了我的腿，我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我在烈日下锄地，割麦，打场。我淋着连绵的春雨，到地里栽红薯。在大雪飘飘的冬季，我拉着架子车往地里运肥。我还脱过坯，打过墙，挖过河，垛过麦秸垛。庄稼活儿我差不多都干过，说起来都不离谱。煤矿的生活也是一样。1970年，我被招到煤矿当上了一名矿工，前后在矿区生活了9个年头。我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不管是农村生活，还是煤矿生活，对我来说都不是他者的生活，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

记 者：您曾有过多年的矿区生活经历，每天都要深入矿井，之后又从事过煤炭地质系统的宣传报道等工作。这些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庆邦：在矿区生活时，我最向往的职业是能当一名记者。调到煤炭部当上记者之后，我热情很高，一有时间就积极到全国各地的煤矿采访。如果说我的矿区生活是一个点，当上记者之后，生活的面积大幅度扩大，由点变成了面。全国各地的煤矿，除了西藏的煤矿，大部分煤矿我都去过。当了20多年记者，对文学创作很有好处。一是打开了眼界，拓宽了胸怀。人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 明江)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三周年之际，由中宣部文艺局主办、国家博物馆承办的“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座谈会11月29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机构和高校的十余名专家，重走了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的路线，重新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讲话视频，身临中国梦提出的现场，重温中国梦提出时的伟大时刻。参观结束后，专家们就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阐释和研究中国梦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广泛讨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是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的

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积淀传承的精华，是5000多年文明智慧的基本元素和珍贵结晶，为中国梦提供了深厚的文明根基、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价值支撑，是实现中国梦的智慧宝库。中国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展现了高超的智慧，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丰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和特殊优势，进一步增强全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将为实现中国梦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大家表示，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应加快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在礼敬传统、文明互鉴、创新发展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智慧、凝聚力量。

中国作家看黔江活动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重庆市黔江区宣传部、区文联联合主办的“《民族文学》重庆黔江创作基地授牌仪式暨中国作家看黔江活动”在黔江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廖奔、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周明、《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晏彪、《作家文摘》总编辑张亚丽等参加活动，一起为“《民族文学》重庆黔江创作基地”授牌。

授牌仪式后，作家们深入到黔江的乡镇进行采访创作，并与当地的写作进行交流。大家就“在新媒体时代我们如何读书”、“散文写作如何才能脱颖而出”、“如何能够在文学写作上持续进步”等问题进行探讨。专家们还为黔江繁荣文学创作及发展文化事业提出了宝贵建议。

(欣 闻)

《人民文学》德文版在京研讨

本报讯 11月23日，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德国大使馆文化处协办的《人民文学》杂志德文版LEUCHTSPUR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郝志强、《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与会并致辞。

阎晶明谈到，作为一本重要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推出德文版，将会有助于推动对外文学交流的发展。近百年来，德国作家的作品对中国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但德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不多，希望今后德语读者能够通过这本杂志欣赏到更多中国文学作品。

郝志强说，德国年轻人对中国作家的作品了解不多，这与文学翻译太少有关，希望以后能增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人民文学》德文版的推出，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希望能够看到LEUCHTSPUR的数字化出版，能更快、更有效地推动双向传播。

研讨会上，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LEUCHTSPUR译审韩瑞祥、编辑总监龚迎新，作家林白、李浩等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德语翻译以及海外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悉，为了让世界读者更方便、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进而提升中国文学的全球影响力，2011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创办了英文版，至今已出版14期，反响热烈。在此基础上，又陆续出版并筹划推出其他10个语种的版本。本期LEUCHTSPUR是《人民文学》推出的第一本德文版，在2015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上获得了广泛关注。

翻译人才发展国际论坛将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记者近日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届“翻译人才发展国际论坛”将于12月12日至13日在京举行。论坛由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主办，将邀请联合国秘书处中央规划协调司、国际口译协会、国际翻译院校联盟等相关人士，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际翻译学院负责人，国内外翻译家、专家、学者等将与会。本届论坛主题为“翻译人才与终身教育”，下设四个分论坛，覆盖高等院校翻译教育、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和知识更新、翻译岗位培训、翻译人才远程教育、翻译人才职业发展、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等翻译人才发展各阶段的论题。论坛旨在汇集各方面关注和需求，整合中外翻译界资源，从翻译人才发展的整体层面开展对话、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翻译事业及翻译人才发展。

据主办方介绍，由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主办的国际翻译家研修活动将于12月14日至20日在京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了许多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翻译家和常年在英语国家工作的华裔翻译家参与其中，同时还邀请了西班牙语和法语翻译家观摩。研修活动包括翻译工作坊、专题对话、公共论坛及文化感知等环节，是一次以翻译家为主体、以中外翻译工作坊为基础的“笔会式”国际人文交流活动。

新书贴

《北平硝烟》

孙晶岩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年9月出版



《北平硝烟》是一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全景式地展现了北京抗战的真实历史。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到北京很多抗日遗址寻访，并访问了许多健在的当事人、见证人，以保证材料和叙述的真实性。

王平：艺术就要贴近百姓

王平是中国评剧院的优秀演员。她曾扮演过多个角色，比如评剧院重点推出的大戏《母亲》中的英雄母亲邓玉芬、《马本仓当官记》中性格泼辣的东北寡妇，还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邻家姐妹……在排练的日子里，她经常是团队中第一个到达排练室的；在不忙的时候，她总会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手捧清茶，阅读一本书，或者观看话剧和歌剧的视频，从中学习别人的表演。

这几年，评剧院针对经典作品进行了适度的改编，甚至将其中几部作品改编成了现代戏。王平坦陈，现代戏相对难演，不像传统戏有前人的表演形式可以借鉴，但是有一条不变的准则：“无论是排什么样的戏，我们演的都是故事当中的角色，传统戏是这样，现代戏更如此，不管是什幺流派，什幺类型的演员，一定要从人物出发。”她也觉得，艺术虽源于生活，需要贴近生活，但能够做到“高于生活”的作品才能称之为艺术。王平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喜欢呈现这些人物身上的正能量。她说，这个世界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美好不纯洁的东西，但是她会将最干净最善良的内容注入到作品当中。

今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评剧院推出了一出大戏《母亲》。作品表现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北京密云一位叫邓玉芬的普通农村妇女，将自己的丈夫和5个儿子全部送上战场，最终他们全部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王平说，这样的人物，如果演得符

号化、脸谱化，观众就不会接受，“还是那句话，要塑造人物，就要把剧中的人物当成自己，把握人物的切身感受，演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王平之所以能够塑造好这么多的人物形象，与她扎实的基本功、丰富的演出经验有关。小学毕业后，11岁的王平考上了评剧团的学员班，从此开始了练声、吊嗓、学唱腔的生活。王平记得，在那段日子里，她经常要随着剧团四处走，特别是冬天农闲的时候，常常下乡演出。农村演出的条件很艰苦，舞台是村里临时搭起来的，穿着单薄戏服的演员们要忍受着刺骨的寒冷登台献唱。晚上，条件好一点的可以住在老乡家里，差一些的只能在村里的学校教室里把条椅拼成床休息。但是，王平却很珍惜少年时的这段经历：“小时候走南闯北，什么样的观众都见过，什么样的舞台都站过，什么样的环境都经历过，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人生的财富。”

进入评剧团工作之后，她还坚持着之前的习惯，定期随剧团参加“星火工程”、“郊区周末场”等系列演出，每年深入基层演出两百多场。然而临时搭建的舞台和简陋的设备，极大地限制了演出的效果。但即便如此，王平和她的同事们还是努力做到最好：在每一次排戏时，将每个人物揣摩到极致；在舞台上表演时，将每一个细节做到最好。

王平谦虚地说，她总会下意识地回避别人对她的夸奖。她惟一想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地排戏、演戏，为大家带去最好的演出。

(赵君竹)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广东诗人走进北大

本报讯 近日，由广东省作协、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我看清了风的形状——2015年广东诗人北大行”诗歌研讨会在京举行。杨克、陈陟云、郑小琼、黄礼孩、卢卫平、阿翔、郭金牛、唐不遇、宋晓贤、凌越等10位广东诗人分别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诗歌观念，十多位诗人和评论家逐个对他们的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分析。大家谈到，广东这片土地、北大这所学校，都有着自由、包容的精神。广东诗人来到北大，实际上是寻找一种精神的共鸣。广东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它虽属于南方，却与婉约的江南不同，有着非常粗犷的一面。移民的涌入，让多种文化在这里混杂、交融，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形态。因此，就像这10位诗人的作品所呈现的，广东诗歌活跃而不喧嚣，尖锐而不极端，习惯于以自省或悲悯的姿态对当下现实进行沉思。从这次研讨的对象来看，这些作品都各具特色，也存在一些可以进步的地方，期待诗人们继续努力，让广东诗歌有更大的发展。

(欣 闻)

责任编辑：黄尚恩 新闻版邮箱：wybxinwen@sina.com